

一士類稿

允之署



行印社版出今古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再版

古今叢  
書之三

一士類稿

每冊實價三百元正

版權所有

|   |   |   |   |
|---|---|---|---|
| 著 | 校 | 印 | 發 |
| 者 | 閱 | 刷 | 行 |
| 者 | 者 | 者 | 所 |

徐 一 士

朱 樸

周 黎 庵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咸陽路二號  
古今出版社  
電話七三七八號

## 瞿 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歷年撰述抽編一部一士類稿，要我作一篇序，這是極榮幸而且極有意義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謂掌故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應當先加以討論。我以爲中國正史與雜史的分途以宋始。我們讀史記漢書，覺得史家敘述一個重要人物每從一二節上描寫，使其人之性情好惡甚著，至於聲音笑貌雖然紙上，即一代興亡大事亦往往從一件事故的發生前後經過著意敘述，使當時參加者之心理與夫事態之變化靡曲折傳出，而其所產生之果自然使讀者領會於心。例如史記寫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張良諫一事，酈食其是有理由的，而張良的話舉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見高祖時的偶然事態，以及倉卒間借箸代籌的神情，酈食其一髮的局勢就在他臨機應變的幾句話。可知當時彼此間的微妙心理。這樣關係千古治亂的大事，就是這樣輕易的被決定了。所以不但高祖與張良兩個人的個性暴露無遺，而且可以將當時主張恢復封建與主張沿襲秦制的兩派人心事和盤托出。司馬氏之所以爲良史，正在於這些地方。後來史家每辦不到而漸趨於官樣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筆之人多少有一點公務的史職在身，而後代的文網較爲苛密，加之私家的傳說太多，不是公認的話不敢說，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據，因此雖然極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記那樣活潑潑地了。不過唐以前的史家雖或不能盡情發揮，猶能於剪裁去取之間示其微意，使後人善於讀書者自己去領會。例如陳壽三國志記高貴鄉公討司馬昭一事，在本紀裏面一字不提，而但載太后令及大將軍上言，便是明明告訴後人這兩篇文章是一種掩飾之詞，更足見高貴鄉公之爲冤死。所以照這樣看來，後世史家所依據之官式史料竟多難於置信

。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難於置信，若是並完全史料而無之，則更不用說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細心體會，又有誰知道呢。

有許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親眼看得到的，這種史料不知埋沒掉多少而成爲千餘年的煨燼塵土了。文選載陸機弔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於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據其所采用者而觀之，則當時史臣所收錄者不但是是一篇口傳的令，而且將彌留顧命時的情形也都記了下來，甚至關於遺令的事後情形也都有一貫的記載，這是很自然的道理。當其大漸時的言語，必不暇自己動筆作書，而必是盡職的侍臣據實筆錄以供他日參考。而所說的話又不是都可以公開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於秘閣，而成爲一種秘密文獻。這一段記載顯示曹操的真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狀態之一斑，較之任何記載更有價值，而陳壽作三國志時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檢閱到這件檔案呢，還是認爲無關於政治而略去不載。總而言之，不能不說史家對於史料之去取雖良史不免有失當的地方。

正史雜史之分途，也可以說就從三國志啓其端。三國志固以文筆嚴潔見長，而敘寫事實亦不免有簡略之失，爲後世官修史書之徒以鈎勒輪廓爲盡職的開一先路。至於雜史之多，也就起於三國。因爲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處的記載不同，有本處的事非本處不能知的，有甲處的事自己記載不詳而轉見於乙處丙處的。其時宣傳與反宣傳的工作都很利害。例如曹瞞傳是失國人作來罵曹操的，我們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爲人。又如陳羣華歆王粲一般人寄書與諸葛亮，明明是代魏國勸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當時中原士大夫對於流亡在西南者之一種同情。推而至於一切瑣屑的遺聞佚事，都有其所以涵之意義。所以陳壽不采而裴松之采以爲注，現在拿裴注與陳志合看，覺得有許多隱情是陳志所未顯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極周慎的博引羣

書替他襯託出來的。雜史之不可廢有如此。

自來成功者之紀載必流於文飾，而失敗者之紀載又每至於湮沒無傳。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如三國事實之見於裴注所收，已經極不容易，這是因為三國鼎峙次第滅亡，到了晉武平吳，回顧漢末以來之史事，其間恩怨已經消泯，沒有很多避忌，所以才能如此。且私家記載總不容易流傳久遠，尤其在刻書之風未盛之時，零篇斷簡，靠着傳鈔，最難持久。但看司馬光修通鑑，所采唐及五代之事實見於雜史者多半今無傳本，足見采擷羣書是一種極可貴的著述事業。然而這些雜史若一種種單獨的看來，大都不免彼此抵牾而生出疑問，又須加以抉擇比較審慎而存錄之。所以裴氏三國志注與司馬氏通鑑考異為功於史學真不小。

唐人修晉以後的史，很喜歡采錄故事，往往瑣屑至於類似笑談。前人頗有不以為然的。這誠然不是史的正裁。然而史家得不着更好的材料，又將如之何呢。就是以故事為史，也還可以考見一時的社會風俗時代心理，這也不是無益的呀。自宋以後，私家的碑傳文字盛行，於是一個人的仕履世系言論著述倒可以瞭如指掌，而其人之情好尚以及其行事之實跡往往不能窺見。於是宋以後之史多是鈔錄些諛墓之文，一傳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處人某科出身歷官某職某事上疏如何某年卒著某書子某某，幾乎成了一種公式，千篇一律，生氣全無。這樣的史還能算史麼。

宋以後的史是必須連同家乘野史小說筆記之流讀的。不但事的曲折隱微，人的性情風格，在正史幾乎全找不着。就是政治社會制度之實際狀況，也必須靠着另外的書來說明。譬如宋元豐之改官制前後種種，在正史上只能知道一個大概。至於究竟怎樣運用的，讀了龐元英文昌雜錄洪邁容齋隨筆方才能知道得多一點。

照史例的原則說來，紀傳體是以人為綱的史，編年體是以時代為綱的史，紀事本末體是以事為綱的史，通

典體是以制度門類爲綱的史。嚴格的注重體例組織，則詳於此必略於彼，若要打破這個藩籬，將四者通而爲一，則必須另有一種新的史裁，融會前人之長，爲後人闢一途徑。這是現在尙辦不到的。爲救濟史裁之拘束以幫助讀史者對於史事之了解，則所謂掌故之學興焉。

掌故之學究竟是什麼呢。下定義殊不容易。但從大體說來，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澈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要達到這種目的，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系淵源師友親族的各種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屑瑣資料具有綜覈之能力，存真去僞，由僞得真。這種條件，本來是治史者所當同具。但是所謂掌故學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裝有無數故事的人，則掌故之學便失去真價值，所以既稱治掌故，則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對。然而僅有方法而無實踐的經驗，也是不行的。中國的社會本來是由於親族鄉黨舉主故吏座主門生同年同學乃至部曲賓僚種種關係錯綜而成。六朝人講究譜學，但能將這本帳記在心中，已經成爲一種專門技能，後世的人事更加複雜，一本帳也記不清楚，必須會合無數本帳方能足用。最好是一生致力於此，若僅恃臨時檢閱，豈能得當。所以掌故學者之職務，乃是治史者所不能離手的一部活詞典。

尋常的解釋又以爲掌故之學即是典章制度，這種解釋自然不是全無理由。關於這一方面的知識，尤其需要實踐的經驗，許多書策上關於典章制度之記載，因爲名物之變遷，習慣之變遷，每不易於索解。宋初的人爲了一個入閣儀的討論，費了無數唇舌。考其經過乃是因爲唐朝的入閣是便殿召對的一種簡單儀禮，後來連這簡單儀禮也變成稀有的事，因之入閣儀反成朝儀之正了。同一入閣，在某時期是這麼一回事，過了這個時期又另是一回事了。這還是名物具在的說法，若在明清兩代則並名物也不是了，苟非博通書史而又能以後來的習慣參較

而推測之，又安能了然於胸中。宋朝的許多制度，元朝人已經不得其解，元朝的制度，我們也很多不得其解，就是清朝的制度，雖然老輩還在，也有許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凡是書策上所不見的，將來必至終古無傳。而書策所已載的，也還待後起之疏通證明，方得其用。

即以彰彰於書策者而論，比如侍郎一官，漢朝人所謂官不過侍郎斷不是唐朝的侍郎，這是有歷史常識的都知道的了。唐朝的侍郎又與宋元豐以前的侍郎不同，宋初的六部侍郎不管本部的事。而明清的侍郎又與宋的侍郎不同，宋的尙書侍郎都算從官，少有參與政務的機會，明清的尙書侍郎則均成爲共同處理政務之一員。至於民國各部的次長，雖與清朝的侍郎近似，實際上亦尙有分別。次長是部中次官，而侍郎則雖名爲卿貳，實在與尙書同爲一部的長官（部中同稱爲掌官）。這些都是易於混淆的地方。所貴於掌故之學者，就在能把握其意義而因之豁然貫通，不致於史事有誤解。

治近代掌故學之資源，所謂筆記一類書占大部分。明代這種書較多，而傳於今者也有限。清代的名著如王士禎池北偶談劉廷璣在園雜識查慎行人海記王應奎柳南隨筆趙翼簞曝雜記阮葵生茶餘客話昭槤嘯亭雜錄英和恩福堂筆記潘世恩思補齋筆記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梁章鉅歸田瑣記陸以湑冷廬雜識周壽昌思益堂日札陳其元庸間齋筆記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齋筆記……，他們多半生當文網嚴密之時，下筆不敢不慎重，所以大致沒有什麼無稽之談。而且他們所處的地位又多是便於考究朝章國故之類的，所以隸事立言大都能不悖於著述之例。決不是泛泛傳聞可比。在這幾點上是後人勝於前人的一種事情。加以耳目較近，研究起來易感興趣而且易於着手。按春秋三世之義，所見所聞所傳聞，遞遠則遞略，愈近則愈詳，然則治掌故必從清代始，這是極自然的。有清末葉文字之繁驟然失效，從前悶着不敢說的一切歷史上疑案漸都成爲好事者之談助。於是談佚聞的紛然而起

。數十年來私家刊行的專著以及散見於報章雜誌，一鱗片羽不脛而走者，不可勝數。人人感覺興趣，遂成一時風尚，至今還是方興未艾。

如果將這些書的內容分析起來，則大概不外乎三類，一是記制度風俗的變遷或是記某種特殊制度風俗。一是記某人的事跡或是關於某人的佚話。一是記某事的經過或是關於某事的特點。此外固然還有，而直接有關於史學者如此而已。這些書大半是拿零星的材料隨意寫來以資談助，最普通的缺點是不曾注明出處，所以材料的正確程度大都不易於斷定。

至於正經談到掌故，則有必須注意的以下幾點。第一是作者的問題。尋常人的見解以爲凡是身歷其境的必然正確，這誠然是比較可取的方法。但是據以往的種種經驗看來，實不盡然。著者本身如果與本事有關，則其下筆或不免以下三種意義：一因恩怨而淆亂是非；一因闢謗而加以飾詞；一因表襮而多加渲染，三者有一於此，即不能視爲正確。唐人關於李牛之紀載，宋人關於熙寧元祐及洛蜀之紀載，（實則宋人一切紀載都不能說無作用）其例比比，無煩徵引。稍有史學常識者也都知道。愈到近代，著書之方法愈工，掩飾變亂之技巧愈進步，意在彼而言在此的不可勝道。其內容所涵之意義，決不是疏淺的讀者所能遽察。

第二是時代的問題。以同時人記同時事，雖然其動機能影響其正確程度，但是舍此以外還有什麼可依據呢。我們無論如何也只可取其比較可信而已。可是要知道同一親歷其境之人，其所紀述是否不錯，還大有分別。就以我們設身處境而論，親歷的事，雖然其情景大致尙在心目，而事實發生之前後當時在場之人物未必能一一記憶真確。動筆的人如不細心推敲，則信筆所至必不免錯誤。這是確有證據的。通鑑考異於晉天福四年下云：『五代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舛悞者。』不經通鑑考異之考訂，讀者又

何從一望而知其錯誤呢。

第三是著述能力的問題。同一記事而有工拙之不同，工於記事的能把握一事中心，自然易得其真象。不然則所記者皆枝葉零星，而離事實愈遠。近人每以爲就某一個有名的人作一番問答，便可得到些掌故。譬如賽金花的生前就很有喜歡向他打聽他的身世，筆錄下來，便成好材料。殊不知賽金花這樣的人不是真能談『天寶遺事』的人，倘竟以他的信口所談爲根據，則未免離題遠矣。著作的高低不僅在秉筆之人，也要看他所從聽受的人是否覈得上供給良好的著作材料。

第四是文字正誤的問題。文字上少了小小的一畫，便可以引起意外的誤會。西洋人記明末的中國海上英雄 Lincong 在呂宋與西班牙人戰爭的事，從前中國的譯者因其原文於 *li* 與 *a* 之間未曾隔斷一小畫，遂誤譯爲李馬奔。而不知方志中固赫然有林鳳之名也。（閩廣人多於名上加阿字，故人稱之爲林阿鳳，而西人譯其音如此，又粵語林字爲閉口音，故讀爲 *lin* 而非 *li*）又如根據西文記載而言台灣史事的，謂清初有高星楷其人占領台灣奉明正朔。按其事乃是鄭成功，鄭曾蒙賜姓朱，故其部下稱之爲國姓爺，由音譯譯回，乃使大名鼎鼎的鄭成功變爲面生可疑的高星楷了。兩事相類，姑舉以爲一種特例。至於尋常文字上的舛錯，更是往往而有。凡千支數字之類，下筆最易致誤，在下筆者出於無心，而考證者遂費無窮唇舌矣。向來考據家都說碑板可以證史文之闕誤，誠然這是常有的事，但是必以碑板所有均可補史之闕，碑板與史不同均可正史之誤，那也是很危險的。（大概碑誌往往根據本家的行狀，而行狀或出於子弟倉卒撰成，甚或丐人代撰，其不符事實者每不暇詳究。又近代習氣專以文詞爲重，並不求其成爲信史，故碑誌更不可深恃。）以我個人所經歷，碑板之誤倒有出人意表的，所以誤不誤須就多數的記載加以鑒別，而不能憑單文孤證。

所以嚴格的談掌故，往往將其所記之事與其時其地其人參互鈎考起來而發現彼此之間有無數的扞格矛盾。然則這種記事竟絕對不容其存在了麼，却又不然。知道他致誤的病根而去其誤，再從其他方面以證其餘之真，則又不但通此一事而且可因此會通許多事。在掌故學者看來，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沒有不可用的材料。乃至平凡而零碎的片紙隻字，都是很可寶貴，在某種適當的地方，必有用的。這真需要老吏斷獄的能力，頭腦要冷靜，記憶要豐富，心思要靈活，眼光要銳敏，不以辨證爲目的而却能盡辨證之用，這才是所需要的掌故學者。

我很感覺到掌故學者殊不容易養成，這種學問憑實物研究是不行的，憑書本的知識是不彀的，不是有特殊修養，必致於事倍功半。我們現在需要年高閱歷多見廣聞的人，將他們的知識經驗以系統的方法津逮後學，使後來的人可以減少冥行摘埴之苦。

但是世上沒有樣樣俱全的人，假如他本是一個史學家，而又深受老輩的薰陶，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那是最好的了。不然則本其超羣絕倫之智慧，從故紙堆中一一研究出來，憑着智慧的想像以搏掄而成一個真的活動事實，這也是極難能可貴的。但是除了他本身的能力而外，還須有傳授他人的能力，使人人可以得其沾溉。這更要緊，更值得我們的寶貴尊重。

徐一士先生的談掌故出名，由於三十年來在各報紙各雜誌所發表的各種稿件。他的號原不是這兩字，因爲筆名出了名大家都不大叫他號了。大家知道他是掌故家，於是他的職業也被埋沒了。以我所知，他決不是像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樣掌故家，然而就其治掌故學的能力而論，的確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後人的地方不少。這是值得疏解的。第一他富於綜合研究的能力。他能將許多類似的故事集中一起，兩辨別其孰爲初孰孰爲苗裔，何

者相異何者相同。第二他能博收材料。他的談掌故，好像取之於筆記及小說者甚多，然決不僅以此爲對象，其所驅遣自正史以至集部旁及外國名著時人雜纂，凡有所見均能利用。甚至旁人視爲毫無價值的，經他的利用，也無不恰當。第三他有極忠實的天性。學問的成就，樸誠是第一條件。無論何種學問，自欺欺人，總要露馬腳的。他的讀書作文，不肯一字放過，不肯有一字不妥，是天賦以治掌故的極好條件。所以他的根柢極充實，而一下筆一開口的時候，都顯示極沈着慎重的態度，這不是他的迂闊，而是他最聰明不失敗的地方。但是這個道理，別人雖然也知道，却未必像他那樣自然，所謂仁者安仁，誠哉其不可及也。第四他有絕強的記憶力。他的博綜固然不必說，若無好的記性，決不能觸類旁通，這也不是讀死書所能辦得到的他。需要記憶古今多少人的名字籍貫世系年代仕履師友，尤其近代的人鄉會科分名次座主房師，乃至於某科的什麼題目，率能有問必答如響斯應，這不能不說先天後天都有關係，尋常人所不易及。（以我所知，留滯諸友之中，膠西柯燕齡君，於正史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數家珍，乃至金石圖錄載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種種難於記憶之事皆羅於胸中。尤熟於歷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別人認爲詰屈聱牙不能句讀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證明如指諸掌。與徐君可謂一時二妙，惟柯君不屑意於著述爲可惜耳。）第五他有偵探的眼光。每於人所不經意的地方，一見即能執其間隙。他人紀載之真僞是非，何處是無心之誤，何處是徵引之誤，何處是傳聞之誤，必難逃其銳目。我們朋友所作的文章，凡是請他過目的，必能看出許多漏洞，使人不得不心悅誠服。我們最易犯的毛病，是長篇文字前後不能照顧，以致語氣失去聯貫，又據他人的話往往不及考察其有無舛誤，他却必能替我們指出。有了這些特長，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掌故家從未到過的境界，也可以說自有徐君而後掌故學可以成爲一種專門有系統的學術，可以期待今後的發展。

徐君出自江南世家，久居薊北，科第簪纓，人倫冠冕，戊戌政變，他的伯父子靜先生父子因主維新而躬罹黨獄，更是衆所共知的。所以他的家世環境又是這樣給予他許多便利，能以身當新舊之交而飽聞當世之事。他又隨宦外省，兼歷京曹，而於各種政治制度皆親見其實地運用情形。不但此也，還有一件，他雖是五十以上的人，而早年曾受近代式之教育，他長於英文，富於近代學識，所以他的治學，條理縝密，態度謹嚴，的確是淵源於近代科學思想以及歐文的技術。至於舊學的修養更不必說。舊知識與新訓練是不容易備於一身的，徐君這一點資格更是可貴了。

徐君與我雖有世交的關係，而情誼則完全是從學問來的。舊學新知，時常互相潛發。十餘年來株守的蹤跡相同，思古之幽情也相同，然而只是以彼此討論爲樂而已，也並未曾計議過預備從事於何種學問何種著作，歲月如流，相顧皆成老態，往者已不可諫，來日更復難知。不免想到他的筆記叢稿，恐怕日久散失未免可惜，於是極力慫恿他早些整理出來，設法先行出版，這話也說了幾年了，直至最近方有成議，居然第一部的一士類稿可以出書了，出書之後，必能風行一時，不消說得。我所願在這裏喚起讀者注意的，則有以下幾點。第一請看他所運用的材料，有許多已經不容易看見的，或是手跡，或是孤本，在當時都是各方面送來借來抄來的，而藏有這些手跡孤本的人，亦必極願意使他能以長久公之於世，所以這部書之出版，不僅是徐君個人之幸也是多數人所引以爲幸的。第二請看他的選材，真合於所謂無一字無來歷一句話，決不會有一條不注明出處，不但著述的體裁理應如此，而且徐君之心重在存公是公非，而並不是欲成一家之言，其微意亦可概見。第三請看他的嚴正公平態度，個人恩怨固不消說絕對沒有。就是有所抑揚，也必先有一番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的手續。實在是衆惡的了，也只有哀矜弗喜而決無投井下石。像這樣的談掌故，真可以成爲絕學而信今傳後了。最後論

到文字上的技術，也有他的特長。他所寫的各稿，行文不事華藻而措詞善合分際，文從字順，看似平易，却是下字均有斤兩，雖喜考證，而筆端不流於沈悶枯燥，仍有含毫邈然之致。不多發議論，而衡斷則甚精覈，耐人尋繹，大凡繁徵博引，往往照顧難周，他却能以一絲不苟的精神處處顧到，左右逢源，妥適周匝，頭緒雖多，而組織嚴密，條理秩然。有時也縱筆題外如所謂『跑野馬』者，然若六轡之在手，操縱自如，歸宿仍在題中，絕無散漫脫節的毛病。至如涉筆成趣，也每有之，皆能出以自然，餘味曲包，而又保持文格，不落鄙猥。聲聲諸端略如上述。文字技術與學識經驗相副相得，以成其作風。他對於作品的責任心極重，所以字句上每煞費推敲，讀者若不留心，或者但覺其平易，以為寫來不甚費力，所謂成如容易却艱辛也。誠然有時很像只是鈔錄的工作，但決不為讀者所嫌惡，反覺引人入勝，讀之惟恐紙盡，不是材料與技術兩樣都臻絕選，何能如此。

我還敢大膽的說，徐君這部書出版以後，或者分批出版以後，其中所徵引的書有許多已經極不易得見而又為讀者所極渴想的，恐怕要依賴徐君的書而幸傳，將來的人或許會從徐君所徵引者輯出許多未見的書，如同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許多佚書一樣。（我會經感覺近人刊布的筆記很有些有價值的，可惜鉛印石印的有很多已經絕版，就是木板書也因為刷印不易，流傳有限，而且這類書往往被人看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不是藏書家學問家所重視，甚至於圖書館也不收，也沒有人拿來著錄作提要，也沒有人替他翻板登廣告賣錢，久而久之，就是風行一時的書也就可以無影無蹤，若是本來不多見的，並書名也必至於湮沒了。然而這種書是普通人所極願意看的，只是苦於看不到。於是慫恿徐君將他所見過的這類書儘量將內容介紹於讀者，彷彿作一部筆記選的樣子，前一二年曾經發表若干在中和月刊，很得讀者贊許。）

但是徐君的著述事業豈得以此為其封域。中國史學上待豪傑而興起的應作的事業尚甚多，如徐君者既受社

會的尊敬，則應致之於寬閒靜穆的環境，供給物質上種種便利，趁他未至甚老之時，儘其能力，作一更大的史學上貢獻，庶幾不負天生此材。而徐君猶屹屹窮居，家無長物，參考書籍每仗旁求，鈔繕辛勞又乏助力，還要較量米鹽奔走衣食，使無一日之閒暇，以盡其所長，讀者又豈能不於展卷之餘爲之浩然而生無限之同情耶。

徐君平日的態度既然是那樣的謙虛而謹慎，則我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恣意作溢美之詞。不但不應作溢美之詞，就是恭惟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意中所要說的主要之點，還是治掌故學之甘苦。談掌故或者可以信口亂道，但博聽者一時好奇，徐君却不是這樣的談法。他最初固然是爲着興趣，據他說自幼喜歡聽人談舊事，喜歡看小說筆記，也喜歡討論小說筆記中的典故，而抉發其得失。但是書看得多了，自然而然的引導他走向綜合研究的道上，尤其近年談掌故的書如此之多起來，每每更使他對於這些書有比較辨別之必要。日積月累，便成功他的一種專門。而我們看了他的文章以後，也覺得掌故學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學問，像他所用的方法是極對的。

假如我是在這裏恭惟的話，却並不是恭惟徐君一個人。我認爲這宗學問將來必要更進步，而後起之秀必有突過前人的地方。爲什麼呢。第一過去的人生在那個環境當中，覺得一切是當然的，是平淡無奇的，是不值一談的，環境嬗變之後，便又成爲陳迹而無從把握了。中國人向來很少保存當代史料的習慣，所以事過境遷都只剩些雪泥鴻爪。今後的人經過從來未有的劇烈變動，歷史的觀感較前人定覺深切，保存史料的常識亦比較爲普遍，於是應用的材料必然較多。雖說近年各種天災人禍的摧毀損失不少的文獻，然而較之前人呢，增廣見聞交換信息的機會究竟容易得多了。憑這一點也就有無限的寶藏足供今後的學者的開發。第二因爲近代交通方式的便利，社會各層聲氣的豁露，事實究竟不容易變亂。縱然人類的感情衝動，一時的政治作用，不免有時操縱着，然而完全顛倒黑白是不行的。加以今後的人能運用科學方法來治史，其鑒別判斷發揮的能力必非前人所能及

。第三學問以專而愈精，掌故學範圍既如是之廣，其中有某種人認為極易了解不需解釋的，而另一種人則又認為不得其解，有看似平淡明白的，而細按起來却又說不出其中的委曲。總而言之，需要系統的整理，使每一名詞得有正確詳盡的解釋，時代隔着愈遠，則了解愈難而愈不肯輕易放過，其推求之方法亦必愈精。譬如顏師古離漢朝比我們近，然而顏注漢書便有許多疏陋的地方，不及近代人之考證精確，並不是說近代人的學問一定勝過顏君，不過近代人讀漢書之苦甚於顏君，所以不得不真認考究而已。所以將來關於國學的一般趨勢，都要比現在進步，但是必須經過若干年之後，有多數專門學者苦心整理出來，使之成為大眾能了解能欣賞的東西。在這青黃不接之際，感覺到學術人才之尚不足用，這是有的。以掌故學而論，我與徐君都常常覺得前途很有樂觀的氣象，而近來同志之多，各有所長，而且能互通聲息毫不隔閡，因之而交換見聞的機會不少，實有從前所不及料所不敢望的，這是何等可喜的事。

最後再談到材料的問題，從前的人固然不甚注意保存史料，就是注意到也苦於沒有好的方法，靠着私家抱殘守缺終於不中用。近年來風氣漸開，大家也知道人事之不可測，惟一的方法是用傳播的方法拿來公開，能拿來製成副本或刊印成書固然最好，就是用間接的方法流傳也終勝於黯然而無聞。有了古今這一類的文史刊物，時常介紹點珍貴的文獻，真是極有益的事。我與徐君都酷好收集筆記年譜日記書札家乘一類的書，可是靠着冷攤的躑躅，所得極為有限，有許多收藏家又是不肯輕易以所得示人的。我想徐君之書出版以後，或者有人願意以其珍貴的家藏借與應用，藉此得供學術界的研究與一般的欣賞，免我們有孤陋寡聞之憾，那又是何等可欣幸的事。

古往今來一切的事，真是浪淘沙一般，依然是這些沙，却被浪一推而又變了一種地位與形式，如是反復無

窮，循環不已而推陳出新，所謂掌故當作如是觀，所謂治掌故學的方法也當作如是觀。

以上所說，質之徐君不知以爲如何。因再作二詩以當題詞，并爲此篇作結。

書供談助老潛夫，穿穴功深九曲珠；萬卷羅胸竟何益，漫誇肉譜與書廚。

厚誣自昔歎苻生，筆錄東軒每任情；賴爾然犀被幽隱，謗書休更不平鳴。

甲申秋日，兌之。

## 孫序

江都汪氏之言。有諷詭可觀者。嘗論荅紳某不在不通之列。旋謂更讀書三十年。可望不通。又論揚州通者三。不通者三。然奇不通之數。如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三子。皆該博負重名。疑此非盡汎儔時彥之謂。不然者。不通之訓。果如流俗所譏議。此其人固更僕難數。烏得以三盡之。又何待更讀書三十年。意者不通云者。特言其明別相而闇共相。此莊周所謂自細視大者不盡。通者有進於是。更能明其共相。此莊周所謂大知觀於遠近。證蠹今故之指歟。湘鄉曾氏。有精明高明之說。將無同斯。竊嘗持此說乾量人物。宜與徐君一士。當世通學也。從事撰述。多歷年所。先後分載雜誌之屬。凡所著錄。每一事。必網羅舊聞以審其是。每一義。必剴察今昔以觀其通。思維縝密。吐詞矜慎。未始有毫末愛憎恩怨之私。凌雜其間。於多聞慎言之道。有德有言之義。殆庶幾焉。而有清一代掌故。尤所諳孰。蓋其彊識穎悟。有絕人者。故能殫見洽聞如此。至造次筆札。皆雅馴可誦。閒摭俚語新詞。而味彌雋永也。讀者莫不傾心。往往有箋而不見。爭以專刊請。近始輯成一士類稿一編。付之剞劂。以餉海內。曩禹縣王角山陳井北兩先生亦嘗論之。謂所述多朝章國故。聞人雅譚。蓋選訂成書。取備一代掌故。上剽唐國史補。宋齊東野語。龍川志之類。後有爲清史注如裴松之者。必見甄錄。曾以此轉質一士。爲所樂聞。何幸今日。克踐斯言。惟所蓄美富。斯編數十篇。猶憾其少。旣欣然爲之序。更願繼是而有請也。孫思昉謹序。